

同文书局

于伯铭

上海同文书局，是我国近代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第一所最大的石印书局，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广东人徐秋畦、徐宏甫、徐润表兄弟合资创办^①，厂址在上海西华德路（今长阳路）。厂内购置石印机十二架，雇佣职工五百名，专门从事翻印古籍版本及字画、碑、帖，不下数十万本，各种法帖、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，下至士子应试，干禄之需，达数万种，同文石印书局在保存古籍遗产方面，有一定的贡献。

我国的石印术，在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开始出现。最早使用石印术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土山湾印刷所，创办人是法国人翁相公及中国人邱子昂二人，所印仅限于天主教之宣传品，如唱经等，并且只在信徒之间传布不流于外。石印书籍，则是英国人美查创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始，独擅其利达四五年，获利最厚的书，是《康熙字典》。“书业见其获利之钜且易，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，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，三家鼎立，垄断一时，诚开风气之先者也。”^②自点石斋、同文书局盛行于世，接踵而起者不下数十家，除上海外，武昌、苏州、宁波、杭州、广东等处，亦相继开设石印书局。

石印书局所以盛行一时，主要因为：第一，石印出书快。当时石印书局，因自己不编译，专翻印古书，觅到一种书，经决定要印，便照像落石，打样校对，即可印订。同时，因使用蒸气机，能使数部印刷机同时开印，容易获利，第二，石印质量高。印书石板平滑如镜，电镜映像真实可靠，“字迹虽细若蚕丝，无不明同厚理。其装璜之古雅，校对之精良，更不待言，诚如书籍之奇观，文林之盛事也”^③，比木刻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。第三，受读者欢迎。“于时科举未废，故所用书籍大抵细行密字，用便场屋舟之用”^④。举子赶考，年青目力好，他们不需宽边大字，而喜欢旅行时便于携带的石印小书，既不影响赶路，又可多带些书。书籍在

供给远方省份时，也便于运输。

鉴于石印书籍有上述优点，故而在当时“获利之钜且易”，吸引了徐润表兄弟们集股于同文书局的热情。

徐润，字雨之，别号愚斋，广东中山县人，十五岁（1852年）“弃书入贾”，随叔父来沪。最初进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，“兢兢业业”，不断升职，为当时洋人和官僚所赏识。他一方面受命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，为轮船招商局和一些矿务局服务，另一方面自己经商，项目繁多，还更番捐买官衔至二品道员。一生中虽然遭到官场倾轧，或投机失败而多次波折，基本上还是一个有财有势的官僚兼资本家。

徐润为什么要投资于书局呢？既有一般书商共同的“射利为主”目标，经济失意，急需赚钱，以得补偿的一面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因素，徐润本来就“酷嗜图籍”，“藏书富有”^⑤，又比一般纯粹追求赚钱的商人高出一筹。所以，同文书局在印行古籍方面的成就更大些，最有名的是两部书。

一部是《二十四史》。二十四史合在一起共3249卷，约4000万字。过去刊印过全套《二十四史》的书，主要有三种版本，最早是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，次为清末由金陵、淮南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“局本”和商务书局的“百纳本”。同文书局在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“股印《廿四史》启”中说：“本局现以2850金购得乾隆初印

① 徐润：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中说：“从弟秋畦、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，余力赞成并附股。”近访徐润孙徐华先生，据回忆：“我祖除投资同文书局外，并未多去过问其内部事务。”同文书局的主持人，当为润之从弟，而非润为主。

② 孙毓棠编，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1辑，第117—119页。

③ 《申报》，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（1887年2月5日）“记蜚英馆”。

④ 净雨：《清代印刷史》。

⑤ 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。

开化纸全史一部,计七百一十本,不敢私为已有,愿与同好共之,拟用石印,较原版略缩,本数则仍其旧。如有愿得是书者,予交英洋壹百元,掣取收条,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,各史随出随取,而得其便。现经添设汽炉,日不停暑,较诸人力尤为敏捷。”^①可见同文书局印的是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,当为齐全的珍本,由于出书快,工本低,售价也比木刻本低廉得多,无疑更易为人购买,更易为读者欢迎。

同文书局印行的另一部大著作是:1892—1894年出版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一部大型类书,全书一万卷,目录四十卷,雍正四年(1726年)定稿成书,清末翻印两次,一是石印本,一是铅印本。同文书局在“股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”中说明:“恭闻是书初成,以活字铜版排印不逾百部,当时惟亲王大臣及总裁是书者各赐一部,余皆藏之内府,……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,用以缩印,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,用以备校,约两年为期,其工可竣。”^②为什么印行这部书?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是为了送给外国人。

“清政府却由总理衙门委托上海同文书局,费金卅五万两,用新法石印了《图书集成》一百部,作为赠送帝国主义国家的礼物。”^③另一说是为了赠送大臣。“时西太后欲翻印《图书集成》百部,为了赏文臣之用。徐(宏甫)偕得之,乃倩女士(徐之姐妹)为介,得引进内务部承办此差。初领内帑卅八万两,订造一百另部,其版圈图样,按照原式放大十分之一,用上等桃花纸石印,原有脱笔,均需描补,内一部用黄陵团龙装订备宸览外,其余百部实仅普通道地而已。此书历三年始竣,工料浩大,亏蚀不资,几中辍,徐托有力者向府关说,加津贴十万,始得毕事。”^④在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中说:“迨光绪十七年辛卯(1891年),内廷传办石印《图书集成》一百部,即由同文书局承印。壬辰年(1892年)开办,甲午年(1894年)全集告竣进呈,从此声誉益隆。”以上说法虽然有些

不同,但相同之处亦可肯定:这次印书为了送人,但数量自然不多,得到此书的人,不能不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臣亲信,或者外国洋人。印行《图书集成》的目的,显然不是为了商业上的买卖,而是负有政治使命的工作,同文书局虽然是私股商办,还是不能摆脱政命官管的羁绊,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共同的特性。

由于同文书局印行了这两部大作品,“其名益噪,至今流传”。除了上述两部著作外,所印《佩文斋书画谱》,《通鉴辑览》,殿本《子史精华》,《资治通鉴》,《通鉴纲目》等等,均很有名,“莫不维妙维肖,精美绝伦,咸推为石印之冠”^⑤。

同文书局和其他石印书局的出版内容,也受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一是随着科举行废的变化,如科举时代,出各种经书及《大题文府》,《小题十万选》一类的书。后来科举改革,要考史鉴策论,于是《二十四史》,《九通》及各种论说,盛行一时。另一是投迎读者所好。一方为供参考玩赏起见,文字书画,诗文碑帖,均翻石印;一方为投一般民众嗜好,所有旧小说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也都石印印行。投民所好,销路也畅些。科举一废,石印书一落千丈,考试的书原售一、二元的,此时一、二角也无人要。大的石印书庄,因考试书的倒霉,都关门了,只剩下几家专印古书和小说的小石印书局。同文书局也不能逃避这个厄运,后期亏蚀甚巨,纯仗私资贴补,难以继续维持,“惟十余年后,印书既多,压本愈重,知难而退,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8年)停办”^⑥。同文书局存在了整整十六年。

① 张静庐: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》,第70页。

② 孙毓棠编: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1辑,第117—119页。

③ 北京图书馆:《印本书籍展览说明》。

④ 陈伯熙:《老上海工商编》。

⑤⑥ 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。

河南省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

1982年4月7日到10日,河南省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。来自本省各地、市的代表115人出席了大会。会议共收到论文37篇。

代表们交流了各地的教学经验,观看了教学录像。与会代表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认真讨论,通过了会章,产生了领导机构。

(豫人)